

哲学人文社会科学在自然科学和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On the Important Role of Philosophy and Humane Studies in Natural Science and Social Development

易杰雄

(北京大学社会发展研究所, 教授 北京 100871)

1978年,我国理论界提出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为打破长期的思想禁锢、摆脱教条主义,促使全民族走上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改革开放道路起了历史性的重要作用。这次思想大讨论将永载中国史册。

不过,同时我们也应当看到,由于我们的干部和群众理论素质不高,此后也出现了另一种偏向,即出现了忽视社会科学的研究和指导作用这一经验主义倾向,最明显的表现是整个社会居然出现了一种热衷于感性化的过程,社会上甚至喊出、唱出了“跟着感觉走”的口号,乃至一位著名的社会科学家居然也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里的科学不包括哲学人文社会科学、哲学人文社会科学不是生产力。大概正因为如此,致使我们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出现了如果更重视哲学人文社会科学本来可以减轻的某些偏差,如,始料不到的严重的两极分化、道德滑坡、人品失范和大量失业人口的出现,等等。因此,时至今日我们仍然有必要进一步认识哲学人文社会科学在社会发展中的重大意义。

笔者认为,哲学人文社会科学在社会现代化发展中的重大作用可以从下述3方面来分析。

一、哲学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相互关系

自然科学是技术进步、生产力提高的决定性前提,归根到底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基础性力量。它与哲学人文社会科学是一种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关系。自然科学的每一重大突破,都为人类提供了一幅更完整的世界图景,为科学世界观的发展与丰富提供了新滋养与新论据。而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水平的高低,则直接制约着自然科学的发展。先进的哲学社会科学会极大地推动自然科学发展,而陈旧、落后的哲学人文社会科学会严重阻碍自然科学与技术进步。前者如文艺复兴运动打破封建专制和神学的禁锢,极大地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促成

了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的繁荣,也带来了自然科学几个世纪的持续高速发展;后者如在中世纪封建专制与神学统治下,哲学人文社会科学一片凋零,也是科学发现、技术发明最少的一个时期。这是从哲学人文社会科学对自然科学作用的方面上讲;而从从作用的途径看,主要有下述3个方面。

一是通过思维和价值取向直接影响自然科学和技术的发展。1953年爱因斯坦在给施威策的一封信就很好地揭示了这一点。他在谈到近代以来中国为什么没有科学技术,而西方近代科学技术发现、发明却层出不穷时指出:“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的,那就是西方哲学家发明的形式逻辑体系(在欧几里德几何中),以及通过系统的实验发现有可能找出因果关系(在文艺复兴时期)。在我看来,中国的贤哲没有走上这两步”(《爱因斯坦文集》第1卷,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第574页)。这两个方面实际上都是讲哲学对自然科学的影响、哲学人文社会科学对自然科学的影响的。

二是通过人们的观念直接起作用的。诸如守旧势力、愚昧偏见的阻挠,旧伦理道德观的干扰,不合理科研体制的束缚,原有认识水平、理论观念的局限,嫉妒心理对同行的伤害,学术权威的霸道和压制,都不仅不利于科学创新,使科学研究受阻,使新发现和新思想的创生、传播、应用被推迟,甚至还可能使创新者蒙难。再如,东方文化在强调“天人合一”时,往往是把自然界作为一种审美的对象,而不是作为认识的对象。这样就导致在我们的传统文化中,认识论和方法论的东西极少。在认识论领域,无论是儒家、道家,还是传入中国后又被中国传统文化改造过的佛教,都是特别强调“直指人心”,这就直接影响到以求真求实为根本的自然科学在中国的发展;而在西方文化中,则特别强调主客分立,把自然界明确地列为认识的客体、征服的对象,所以在西方文化典籍中,认识论、方法论的东西极多,如亚里士多德的《工具论》、培根的《新工具》,等等。这使西方人不仅重真,更是发展了一套求真的办法,

有力地推动了西方自然科学,特别是近代自然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而在穆斯林国家,有关计划生育方面的科学技术就很难开展研究;当年琴纳发现可以通过接种牛痘来预防天花这种传染病的肆虐,这本来是一项能拯救人类大量生命的划时代的伟大创举,可是当时有人以“种了牛痘会使人长出牛角、声音变得如同牛叫”这种愚昧的偏见蛊惑人们,阻挠琴纳这项科学研究和成果的推广,还使琴纳本人的身心受到极大的摧残。这类情况在自然科学史上不胜枚举。

三是表现在通过权力中介直接对自然科学的压制或鼓励方面。这与当权者重不重视自然科学和技术、重视什么样的科学和技术;是给科学技术以实际的扶助、支持,还是压制科学技术研究、打击科技创新者直接相关的。在神权、王权合一的中世纪,由于统治者害怕老百姓掌握了科学真理会动摇他们的统治基础,所以总是残酷打击迫害科学家,千方百计压制科学研究和科学思想的传播。如宗教裁判所审讯伽利略、把布鲁诺烧死在鲜花广场就是最突出的例子,在那个黑暗的时代,只有少数能供统治者玩乐的科学技术才能得到发展。又如前苏联为了同美国争霸,在财力有限的情况下,当局只对军事科学及相关的技术门类大力扶植,使之取得了较突出的进步,但却使其整个科学技术陷入了一种畸形和病态的发展。

哲学人文社会科学对自然科学的制约不仅表现为对科学研究本身可以产生完全不同的影响,而且影响到如何运用自然科学的成果上,如:中国古代发明了指南针,但仅停留在用来看风水上,而传入西方后,人家却利用它发展了航海业;中国发明了炸药,只知道用它制造鞭炮和礼花,西方却把它用于矿山开采和军事工业,取得了大成功和大收益。

从上述的诸例中可一般看出哲学人文社会科学对于社会发展的作用比自然科学对社会发展的作用更具根本性,特别是哲学、政治学、法学等学科与具体的某一自然科学学科之间相比更可以说是一种统领与被统领的关系。这就是说,自然科学在相当程度上是听命于、受制于社会科学的,是被社会科学所左右的。历史已一再证明,只有有了高度发达的哲学人文社会科学,才可能有高水平的自然科学与技术的出现。

二、哲学人文社会科学与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关系

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只有持续、协调地向前发展,才能不断满足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才能保证全体公民享有有尊严的、自由幸福的生

活。而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如果没有高度发达的哲学人文社会科学,就如一个人缺失健全的大脑,缺失灵魂一样,就难以制定出科学性的发展路线,难以确立明智的发展战略,也不可能产生好的方针、政策,一句话,就不可能将社会推向健全、持续的发展道路。不仅如此,甚至连起码的社会稳定都很难维持。在人类文明发展到今天的条件下,情况尤其是如此。

历史的经验表明,每当社会处于重大变革时期,必须有先进的思想观念为清除社会污垢、为开辟继续发展的道路指明方向,这时这种上层建筑对社会发展的决定性的反作用尤其显得突出。过去,人类社会的重大变革几百年、上千年才发生一次,因此,先进观念的重大意义、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的巨大历史作用不易引起人们的关注。现如今,社会发展的节奏越来越快,重大变革一个接着一个,先进观念、哲学人文社会科学对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反作用几乎形成了一组连续不断的牵动链条。不重视哲学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落后,特别是不重视涉及到认识论、方法论、世界观、价值观等这些对问题研究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哲学研究的落后;对我们的基本国情、对作为我们赖以发展的大背景的全球发展趋势、对中国与世界的互动关系缺乏研究,以及对我们自身的需要与能力、对自身与客观世界之间的价值关系的认识与评价这些具有全局性、战略性的重大问题缺乏研究、缺乏前瞻性,乃至观念陈旧,我们就不可能及时采取正确的战略策略和得力措施,在剧烈的国际竞争中就会迅速地拉大与别国的距离,被人家远远甩在后头,变得更加落后,以至永远处于被动地位。从这个意义上讲,可以说,今天世界上国与国之间的竞争,首先表现为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方面的竞争。哲学人文社会科学作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引导人如何面对现实生活的科学,也就成为引领社会前进、推动历史发展与社会进步的关键性智理力量。近代以来,我国所以越来越落后的教训之一,即在于没有必要的社会科学研究。这有大量历史史实可供佐证。

17世纪末,乾隆皇帝拒绝接见英国庞大的使团,从而失去了与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国家来往,失去促使本国参与世界发展的一次大好机会。就事件表面原因看,似乎仅仅是为了坚持清廷皇朝的礼仪制度,实际上是置国家的利益于不顾。而问题的实质在于,由于康熙晚年禁教,雍正又完全封关,那时中国对飞速发展的世界已茫然无知,根本没有认识到社会已进入到只有资本主义制度才能获得飞速进步的时代。他们还在津津乐道于所谓的“天朝上国”、“康乾盛世”,还在拼命巩固、加强以人治为主要特征的封建专制制度。

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美日两国的经济战后面

的背景态势变化,也是这种关系的最新证明。自上个世纪 60 年代起,日本通过推动技术革命,生产出了各种新颖的家用电器和性能好、耗能低的汽车,又通过大力提升产品质量和营销活动,极大地开拓了自己的国际市场,使日本的经济有了长足的进步。以至于到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日本竟有人狂妄地喊出了要“买下澳洲”、“买下美国”的口号。而当时的美国,财政赤字庞大、经济严重滞涨、企业缺乏活力。在日本咄咄逼人的严峻挑战面前,美国人正是通过深入的社会科学研究后,采取了两大战略,才使自己在与日本的经济竞争中不仅摆脱了困境,而且大获全胜。美国一方面利用日本的自满心理,主动贬低美元的汇率。这样不仅有力阻击了外国商品的大量流入,还为本国吸引到大量外资,从而有力地促进了本国的生产与就业,使美国经济迅速复苏。另一方面,美国充分认识到高科技对增加商品的高附加值、高回报率,对提高商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的巨大意义,就在日本仍在全力加大对制造业的投入时,美国却已悄悄地以百倍的努力转向高科技领域;当日本人还在沾沾自喜于发明、推出了传真机,自以为不可一世时,美国已搞出了英特网,出现了一批像比尔·盖茨所领导的这类超巨型的国际高科技公司,并由此把日本经济击倒于地,使它至今恢复不了元气,以至日本学者事后惊呼这是他们“二战”以来的最大惨败。

由上可见,若想能“决胜千里外”,首先就要靠正确的“运筹帷幄中”。高水平的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恰是这种帷幄运筹的要害所在。

三、哲学人文社会科学与人生的关系

人类社会是人为人类自身而组成的。为了人,为了一切人,是人类社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的。总之,人类的一切活动归根到底是为了人自身。因此,马克思主义最倡导尊重人,认为人是最可宝贵的,最终目的就是要争取每个人都能获得自由、全面、协调的发展。然而怎样才能达至这一理想呢?

首先,我们要问:人该怎么生存、生活,人生之路该怎么走,人生意义究竟何在,真正的人生幸福何在,怎样才能达至这样的幸福?怎样才能成为一个高尚的人、有益于社会的人?怎样才能保证我们每一个人在回首往事时“不为碌碌无为而悔恨,不

为虚度年华而惋惜”,不为自己无可挽回地走错了路、做错了事而痛心疾首呢?为什么有些人没有权、没有钱时拼命争权、挣钱,但到有了权、有了大量的金钱后却又陷入“声色犬马”,反而搞得妻离子散,甚至弄得年纪轻轻一身是病,感到更为不幸了呢?如何让自己认识自然、认识社会、认识自我,找到一条最能发挥自己潜能、对社会最有益,同时使自身生命辉煌的道路?所有这些问题是每个当代人都必须面对的重要问题。这些关系到世界观、人生观、价值取向的根本问题,首先而且主要是依靠哲学人文社会科学才能真正获得解决。

其次,在你希望享受人生幸福,获得自由、全面、协调的发展的同时,你还必须承认别人也同样具有这种不可渡让的权利。这样,人与人之间就有一个如何相处,以保证既有利于自身又有利于他人的共同生活的准则和道德环境的问题。这涉及道德观念,涉及要懂得按社会规范约束自己。而有些人不愿遵守社会上大多数人的约定,他们的所作所为危及到社会和他人的权利和自由,社会就必须对其绳之以法。这就是需要有法律的根由。否则连起码的社会安定都没有,更惶论什么个人的幸福生活与发展了;而道德理念和操守也是要靠哲学人文社会科学来培育来熏陶的,法律制度的建立也需要建立在充分的人文社会科学综合研究的基础上。

第三,个人、民族、国家的存在不可能是孤立的,也不应该是自我封闭的,在全球化日益明显的今天尤其如此。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如何理性地解决相互之间的矛盾,创造一个既有利于自己也有利于他人发展的国际环境,以及人们为了自身的生存与发展如何才能与大自然和谐共处,所有这些重大问题的解决最后也皆有赖于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和指引。

总之,能否充分认识哲学人文社会科学对社会发展,对我们国家、民族和我们每个人自身的生存与发展具有的巨大意义,能否以充分理性的哲学人文社会科学来指导我们的思想和行动,是直接关系到我国能否快速建成现代化强国,所有国民能否过上充分尊严、充分自主自由的生活的一个根本性的大问题。在这个大问题上,社会的方方面面和每一个人不可不思、不可不察、不可不自检自省,并应终有所悟。此乃中华民族 21 世纪振兴大业能否成功的关键所在。

(责任编辑 蔡德诚)

科技动态

我国科学家电子克隆百个新基因、纠正编码序列错误,首次在国际人类基因组大会上获奖

北京大学人类疾病基因研究中心博士后张德礼等人

的论文《人类新基因的电子克隆与实验确认》,在不久前
(下转第 28 页)